



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王天玉◎著



妇女何在？ 三江并流诸峡谷区的性别政治

芑野东南的民族丛书

何国强 主编

中山大学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王天玉◎著



荒野东南的民族丛书

何国强 主编

妇女何在？ 三江并流诸峡谷区的性别政治

中山大学出版社

· 广州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妇女何在? 三江并流诸峡谷区的性别政治/王天玉著.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13. 12

(芄野东南的民族丛书/何国强主编)

ISBN 978 - 7 - 306 - 04697 - 0

I. ①妇… II. ①王… III. ①女性—生活状况—研究—云南省
IV. ①D669. 6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16484 号

出版人: 徐 劲

策划编辑: 嵇春霞

责任编辑: 嵇春霞

封面设计: 林绵华 曹巩华

责任校对: 廖泽恩

责任技编: 何雅涛

出版发行: 中山大学出版社

电 话: 编辑部 020 - 84111996, 84113349, 84111997, 84110779

发行部 020 - 84111998, 84111981, 84111160

地 址: 广州市新港西路 135 号

邮 编: 510275 传 真: 020 - 84036565

网 址: <http://www.zsup.com.cn> E-mail: zdcbs@mail.sysu.edu.cn

印 刷 者: 广州中大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787mm × 1092mm 1/16 18.75 印张 355 千字

版次印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2000 册 定 价: 46.00 元

如发现本书因印装质量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总 序

黄淑婷

青藏高原古称“羌野”^①，“喜马拉雅”与“横断”两条山脉在东南交汇，形成北半球地表褶皱最明显而紧密的区域——纵横千里，层峦叠嶂，忽而峡谷幽深、激流汹涌，忽而悬崖突兀、雪峰傲立。雄奇的景观掩饰着严酷的自然。适宜耕种的土地集中在河谷，陡峭的高坡土层稀疏、岩石裸露、杂草丛生，经常发生泥石流。山川、植被、动物、村庄依季节交替呈现出各种姿态：旱季，尘土飞扬、风霜严寒、万物萧条；雨季，四野青翠、鸟语花香、人畜徜徉于云端。

羌野东南素有“民族摇篮”之称。在北纬25°~38°、东经90°~104°的广袤区域，由东至西，有金沙江、澜沧江、怒江、独龙江和雅鲁藏布江，史前时代的汉羌之争，造成部分羌人融为汉族，部分羌人西迁。^②西迁的羌人一部分沿着江河古道北上甘青，另一部分南下川滇，到达今川、滇、藏交界区，更有一些部落进入了东南亚。他们南北行走的整套路线分布的区域到公元前4世纪业已形成民族走廊。《史记》记载了张骞出使大夏（今阿富汗）见到四川特产的见闻^③，那是公元前2世纪发生的事情。又过了两个世纪，最后一批迁徙者

① 《诗经·小雅·小明》曰：“明明上天，照临下土。我征徂西，至于羌野。二月初吉，载离寒暑。心之忧矣，其毒大苦！……”大意为周天子令诸侯征伐氐羌系部落，西行到青藏高原，将士思乡，无心恋战，企图班师回朝的情景。《说文解字》解“羌”，一为“远荒”；一为草本植物，如“秦羌”——兰花形，生长于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接壤地带、海拔3000米的荒野，愈往西愈密。故“羌野”指今青藏高原东部，即今川、青、滇、藏四个省（自治区）相交界的区域。

② 如（南北朝）范晔《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第七十七》（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252~253册）有“秦献公初立，欲复穆公之迹，兵临渭首，灭狄獯戎。忍季父印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的记载，说战国初期（公元前475年）以“昂”为首的一支羌人迫于族群竞争的压力，由今甘陕地区向西南徙迁至玉树地区。

③ 汉朝的四川特产远播大夏绝不可能走西域丝绸之路，那样将徒增路程，最有可能的是走西南丝绸之路，起点为成都，终点为印度甚至波斯（今伊朗），中间点为夜郎（今贵州）、滇（今昆明）、南诏（今大理）、缅甸。这说明中西交通很早就贯通了。

沿着民族走廊进入东南亚。东晋、十六国时期（317—420年），鲜卑族从大兴安岭西迁，抵达青海湖与当地羌人杂处，出现西羌、吐谷浑、白兰、党项、附国、吐蕃、姜人等古代部族，也有南迁的情况出现。各民族部落在南迁路中定居、联姻、繁衍，发生贸易、战争和宗教行为，经过千百年的基因采借与文化交汇，演变出藏族、门巴族、珞巴族、纳西族、傈僳族、怒族、独龙族、景颇（克钦）族、克伦族、骠族、缅族、掸族等境内外民族。^①元明以降，封建国家的势力先后侵及这片土地。目前，一块归中国，一块归印度，一块归缅甸。《艮野东南的民族丛书》就揭示了中国西南川、滇、藏和川、青、藏接壤地带极具内涵的民族文化。这些民族是藏族、纳西族、怒族、独龙族和傈僳族。这些民族人们的体质特征与三支种群有关：①蒙古北亚人，特征是高身材、中头型、高鼻型、前额平坦、黑眼珠，男人高大英俊，女人身材颀长；②蒙古南亚人，特征是身材略矮、低头型、前额微窄、褐色眼珠、低鼻型；③“藏彝走廊”型，介于前两者之间，又自成一类，其特征是中身材、中头型、中鼻型，孩子的眼珠较黑，成人的眼珠泛褐。具体来说，怒族和独龙族人带有蒙古南亚人的体质特征，藏族、纳西族和傈僳族人带有“藏彝走廊”型的体质特征。由于藏族人的来源复杂，内部族群众多，有的体质特征偏向蒙古北亚人。例如，三岩藏族人的体质特征与塔吉克族、维吾尔族、锡伯族、哈萨克族、蒙古族等北方民族关系密切些，跟藏彝类型的藏族关系疏远些。^②无论体质特征如何，这5个民族的人民都有率真淳厚、健谈好客、谦让刚毅、吃苦耐劳的一面。人们因地制宜谋取生活资料，建造房屋，修建梯田，引水渡槽，高山放牧；人们也抽烟喝酒、唱歌跳舞，知足常乐。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组织集中进行民族识别（1953—1956年）和少数民族语言与社会历史调查（1956—1958年）。根据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的描述，当时藏族、纳西族、怒族、独龙族和傈僳族等民族已出现社会分化：有的社会结构呈尖锥形，如藏族的农奴制、纳西族的土司制；有的社会结构呈钝锥形，如保留着原始公社残余的怒族和独龙族。民族文化的保持与传承是通过社会结构来实现的。独龙江两岸的村落出现了头人、大小巫师（南木萨、龙萨）、工匠、平民、家奴。前三种人基本上是富裕的族人，他们拥有土地，蓄养奴隶，并未完全脱离劳动。奴隶来自债务和买卖，成为家庭的一员，由主人安排婚姻，给予经济开支。奴隶在公共场合（如祭礼、

① 参见（五代）刘昫《旧唐书》卷197列传第147（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268～271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和（宋）欧阳修《新唐书》卷222上列传第147上下（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272～276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关于南蛮、西南蛮和骠国的描述。

② 参见何国强、杨晓芹、王天玉等《三岩藏族的体质特征研究》，载《人类学学报》2009年第4期，第408～417页。

公议、公断等)与平民有身份界限。劳动过程中主仆地位不同,主人为奴隶提供生产资料(如土地、牲畜、农具、种子),并占有全部收获物。人们在社会结构中各居其位,各层次的差别不大,在血缘、地缘基础上发生的共济、共庆、换工等集体行为维持着内部平等,原始宗教和基督教起到恐吓叛逆者、安抚民众、制止反抗的作用。旧的社会结构被打碎以后,新的社会结构逐步建立,其所传承的文化与过去有着质的不同。

17世纪,西方人陆续进入喜马拉雅东部山区与横断山脉南部的多条河谷。早期的传教士、探险家带着猎奇的眼光看待这里的风土人情。19世纪伊始,民族学家、地理学家、行政人员、桥梁工程师开始进入这片地域上无人知晓、地图上一片空白的沃野。到20世纪40年代末的150年间,他们记录了大量宝贵的材料。英国、美国、印度三国学者的成绩尤为突出,如果只见他们为殖民政府服务的一面而不见其科学记述的一面是不公平的。在此,我愿意借鉴沙钦·罗伊的书单^①,肯定J. 马肯齐、J. 布特勒、G. W. 贝雷斯福德、A. F. 查特、P. C. 巴利、B. C. 戈海尔、M. D. 普格^②等人的工作;我还要提到F. M. 贝利、F. K. 沃德、维雷尔·埃尔温、P. N. S. 古塔、马骏达、N. 罗伊、B. C. 古哈和S. 罗伊等人的努力,特别是约瑟夫·洛克、克里斯托夫·冯·菲尤勒-海门道夫和埃得蒙·利奇的奉献。

洛克于1922年到达中国西南边陲,在川、青、甘、滇接壤地带考察,为美国农业部、国家地理协会和哈佛大学收集植物和飞禽标本,在丽江度过了27年。随着时间的推移,洛克的研究兴趣转移到纳西族的文化上。他的《纳西英语百科词典》收入了东巴教及濒于消亡的古纳西语,他撰写的《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叙述了当时甘青交界处、滇西北、川西南和西藏纳西族居住区域的地理、历史、物产和文化。1992年,迈克尔·阿里斯在纽约出版了《喇嘛、土司和强盗》,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回顾了洛克在川、滇、藏的田野研究经历。^③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利奇在克钦山区打游击。那个地区为中国的滇、藏和印度的阿萨姆邦三面环绕,有号称“野人山”的莽莽丛林。利奇广泛地接

① 参见(印)沙钦·罗伊《珞巴族阿迪人的文化》,李坚尚、丛晓明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7~302页。

② 他们的代表作分别为《孟加拉东北极边地区山区部落记事》(1836年版)、《阿萨姆山区部落概述》(1847年伦敦版)、《阿萨姆东北边境记》(1881年西隆版、1906年重印)、《阿波尔的吊桥》(载《皇家工程师》1912年第16卷)、《阿萨姆山区部落的头饰》(载《皇家孟加拉亚细亚学会会刊》1929年总字第25卷)、《阿波尔人的农业组织》(载《人类学系调查报告》1954年第3卷第2册)、《东北边境特区的娱乐活动》(1958年版)等,这里仅仅提到很少的一部分。

③ 参见Michael Aris et al. *Lamas, Princes, and Brigands: Joseph Rock's Photographs of the Tibetan Borderlands of China*. China House Gallery, 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 1992.

触克钦人，于1954年出版《上缅甸诸政治体系》，提出社会转变的动力学模型。几乎在同一时期，克里斯托夫·冯·菲尤勒-海门道夫在印度调查了10年，期间以特派员的身份在阿萨姆地区工作两年。他和妻子贝蒂·勃纳多在调查阿帕塔尼人^①的间隙中，专程到麦克马洪线以南的斯皮峡谷，那里距离西藏的瓦弄咫尺之遥。因物资供应不足，1944年4月2日夫妇俩开始撤退，准备翌年再进行调查，后因印度政府决定推迟这项计划，最终未能进入西藏察隅地区。海门道夫基于田野调查的12本书^②对于青藏高原的研究极具参考价值。

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民族学家，无论是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印度人，还是中国人，都是在利用前人收集的原始资料、绘制的地图、提炼的概念、阐述的命题和他们的民族识别、文化分类的成果，并汲取他们务实与求真的精神力量。

中国学者对青藏高原东南部的民族调查可追溯到抗日战争时期，左仁极、羊泽、朱刚夫、李式金、李中定、陶云逵、黄举安（以姓氏笔画为序）等人曾赴三江（金沙江、澜沧江、怒江）并流地区，调查成果虽然一鳞半爪，但科学精神不可低估。李霖灿、方国瑜、杨仲鸿对纳西语的研究尤其值得一提。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十年间，我的同仁，如王辅仁、王晓义、孙宏开、刘龙初、刘芳贤、宋恩常、宋兆麟、吴从众、李坚尚、杨毓襄、张江华、姚兆麟、龚佩华、谭克让、蔡家骐、欧阳觉亚（以姓氏笔画为序）等，跋涉于川、青、滇、藏交界区的山水之间，也提出批判地学习和吸收西方人类学的任务。^③1979年，西藏社会科学院资料情报研究所在北京成立，后迁至拉萨，组织翻译了一批文献，吴泽霖、费孝通都身体力行地做过译介工作。^④由于各种原因，我们的研究起步较晚，田野研究缺乏长期性、系统性，理论方法上也有故步自封的表现，偏重于社会经济形态的素材，而较容易忽视社会组织、风俗制度与意识形态的素材。

① 中国民族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阿帕塔尼人与珞巴族人同源，阿帕塔尼是珞巴族的组成部分。珞巴族包含20多个部落，如尼升、巴依、玛雅、纳、崩尼等，其经济形态与独龙族完全相同。

② 它们是《赤裸的那加人：阿萨姆邦的猎头部落的战争与和平》（1939年第1版、1968年第2版、1976年第3版）、《苏班西尼地区的民族学注释》（1947年版）、《喜马拉雅山区未开化的民族》（1955年版）、《阿帕塔尼人和他们的邻族：喜马拉雅山东部的一个原始社会》（1962年版，有中译本）、《尼泊尔的夏尔巴人：信佛的高地居民》（1964年版）、《尼泊尔、印度和锡兰的社会等级制度和血缘关系：对印度教与佛教相接触地区的人类学研究》（1966年版）、《尼泊尔人类学述略》（1974年版）、《喜马拉雅山区的贸易者：尼泊尔高地的生活》（1975年版，前三章半有中译本）、《喜马拉雅山地部落：从牲畜交换到现金交易》（1980年版）、《阿鲁纳恰尔邦的山地人》（1982年版）、《西藏文明的复兴》（1990年版）和《在印度部落中生活：一位人类学家的自传》（1990年版中译本）。

③ 参见林耀华《序》，见黄淑娉、龚佩华《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④ 参见《费孝通译文集·前言》（上册），群言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强调“补课”,出版了不少社会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的理论著述,这是可喜可贺的。最近十几年,获得高级职称的中青年学者也越来越多。但是,不可否认,一些民族学工作者欠缺实地调查的经历,学界对田野调查的要求放松,对边陲少数民族的研究远远不够,市面上田野研究的著述稀少。有人说,目前田野工作的条件(如交通、通讯、住宿、饮食、医疗、安全、语言沟通、调查工具和手段等)较之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不知改善了多少,可如今的实地调查与书斋研究的比例较之于过去不知减少了多少。^①本人深有同感。我虽然退休多年,但也知道一点外面的情况。现在科研的资助力度每年都在增大,下达的课题也在增多,出版界欣欣向荣,民族类的期刊、书籍相当多;但是,深入扎实的调查研究没有跟上来。由于辛勤收集第一手资料和认真提炼、精巧构思并以朴实平正的笔调叙述的作品不太为社会所赏识和鼓励,因此田野作品越来越少。这种情况与历史的发展很不合拍。就青藏高原东南部而言,随着旅游的开发,三江并流自然景观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社会对非物质文化的保护意识被带动起来了,国内外迫切需要了解这一区域的民族现状,抢救、整理和保存当地的原生态文化迫在眉睫。但经常到农牧区做调查的人不多。原因何在?这恐怕与投入和产出的衡量标准有关。譬如,有些环境陌生而艰苦,原创性作品生产周期长,即使出得来,社会反应也需要一定时间,不如“跟风”成效快。“不可否认,学界急功近利的浮躁之风,评判成果室内室外一刀切的做法,都是使田野调查边缘化的原因。”^②我认为,端正调查之风、调整激励机制势在必行,否则民族学研究将难以为继,更谈不上以良好的姿态服务于社会。

西北川、青、藏交界区,以及西南边陲川、滇、藏接壤地区,民族学资源异常丰富,吸引着以何国强教授为首的研究团队不畏艰苦、锲而不舍地调研。这套由7部专著组成的丛书即有选择性地介绍了那里的民族文化。分册和作者名依次为《青藏高原的婚姻和土地:引入兄弟共妻制的分析》(坚赞才旦、许韶明)、《碧罗雪山两麓人民的生计模式》(李何春、李亚锋)、《整体稀缺与文化适应:三岩的帕措、红教和民俗》(许韶明、坚赞才旦)、《独龙江文化史纲:傈人及其邻族的社会变迁研究》(张劲夫、罗波)、《青藏高原东部的丧葬制度研究》(叶远飘)、《妇女何在?三江并流诸峡谷区的性别政治》(王天玉)、《滇藏澜沧江谷地的教派冲突》(王晓、高薇茗、魏乐平)。翻开细细品

① 参见郝时远主编《田野调查实录:民族调查回忆·前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

② 英国皇家人类学会编订:《人类学的询问与记录·序言》,周云水、许韶明、谭青松等译,国际炎黄文化出版社2009年版,第13~14页。

味，看得出作者们长期研究的积累。主编何国强教授是我的学生，也是这个研究团队的组织者。他17年来坚持探索汉藏区域文化，主张多学科相结合，调查素材、史志和理论三点互补，中外资料融会贯通，以及汉族区域和少数民族区域的文化现象互为衬托的研究思路。自1996年夏天至今，他已11次踏上青藏高原。担任博士生导师以后，他努力寻求基金会的支持^①，推动每一届研究生到青藏高原东部和东南部选题作论文，秉承老一辈民族学家研究西南民族的传统，深入偏远的高山峡谷。据我所知，另外10位中青年作者在跟随他学习期间，除极少数人之外，皆有1年左右的调查经历，目前分别在高校或科研部门工作。他们的成果与书斋式的研究不同，每一本书都充满鲜活的材料，讲理论、重实际，穿插纵横（时空）比较和跨文化研究（类型）比较，散发着田野的芬芳。

调查员根据已有的知识草拟提纲，到当地观察、询问和感受，苦学语言，一丝不苟地记录，孜孜不倦地追寻文化变迁的足迹，修正调查提纲和理论预设。他们入乡随俗、遵循当地礼节，与村民建立互信，由此获得可信的感知材料。但这套丛书不是田野材料的机械堆砌，而是在科学方法和理论模块引导下的分析、综合与描述，不仅揭示了该地区存在的一些问题——如风俗制度的动力和机制、传统生计的命运、社会转型时期妇女的角色变迁等——而且对这些问题做出了切合实际的解答。

这套丛书坚持了民族学研究偏远之地的优良传统，同时强调多维视角，突出科研的前沿性、创新性及应用性，对于边疆少数民族的研究具有弥足珍贵的作用，同时给东南亚乃至世界的民族学提供了参考价值；在抢救和整理濒临绝境的原生态文化方面，体现了学术研究在增进国民福祉及促进社会和谐过程中的作用，在为西部开发提供决策依据并带动民族文化的保护性研究等方面均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这套丛书还凸显了“好料做好菜”的诀窍。前期4个课题资助，10余年田野调查取得的第一手资料绝不会自动转化为社会公认的产品，需要紧扣“民族特色”提炼选题，科学搭配，形成整体效应。编者先是将婚姻与丧葬制度、血缘组织、传统生计、本地宗教和外来宗教（东巴教、藏传佛教和天主教）的碰撞、妇女地位、先进民族的帮助与后进民族的发展等选题集合在一个总题目下共同反映特定区域的文化，“好菜”就做了一半；继而在中山大学

^① 本研究相关课题获得4次资助，即“青藏高原的兄弟共妻制研究：以卫藏和康的五个社区为例”（香港中山大学高等学术研究基金，2004—2005年）、“青藏高原东部三江并流地区民族文化的历史人类学研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2006—2008年）、“三江并流峡谷的民族文化和社会结构变迁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07—2009年）、“川青滇藏交界区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动力学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12—2014年）。

出版社的鼎力协助下申请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争取新的资源来整合后续工作。这样，整道“菜”就做好了。以上两点在何国强教授与中山大学出版社的通力合作中可见端倪，同时专家的支持^①也相当重要。在这个基础上，各分册的作者和责任编辑保持良好的互动，认真审稿，精益求精地修改文本、补充资料、优化结构，本着为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对待自己的职业。凡此皆说明学术界与出版界的精诚合作对于完成科研成果转换的重要作用。

^① 这套丛书于2011年入选“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2012年入选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两次申报工作，均得到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任新建研究员和中国人民大学胡鸿保教授的极力推荐。

前 言

位处青藏高原东南缘的三江并流峡谷因其文化多样性为在跨文化视野中研究性别政治问题提供了宝贵的学术资源与分析对象，但由于受到以往研究视野与理论发展阶段的影响，人们对这一区域内妇女群体的关注仍较为有限。本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人类学的研究理论与方法，试图从政治人类学的视角来审视这一区域内4个主要民族（即藏族、纳西族、怒族和独龙族）社会的性别政治问题，从婚姻形态、血缘继嗣、亲属称谓、婚姻支付、性别分工、宗教信仰、代际传递等方面展开研究；在参考大量文献和史料的同时，通过实地田野调查和近距离的观察与访谈，详细描述了身处各类特殊婚姻形态中妇女的真实生活，系统探讨不同婚姻形态和家庭内外的社会性别关系与发展动因，为更全面而深入地理解性别政治问题的产生、发展与变迁提供一种新颖的视角和参照，亦为分析和理解跨文化视野中的性别政治问题提供重要的民族志资料。

本书主要由以下7个部分的内容所构成：

第一章介绍多种独特性并存的三江并流峡谷。包括地理位置、生态环境和族群往来交融的历史文化积淀等内容，构建研究对象生活的真实环境。横断山脉崇山峻岭中的三江并流峡谷地处川、滇、藏交界地带，纵横分布的江河将横断山区切割为诸多深谷高岭和一块块不连贯的台地，由此形成的许多相对独立且封闭的地理区域使得这里成为生物多样性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历史上往来交融的族群则更加丰富了这片区域的文化多样性，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婚姻形态和性别政治面貌也因此具有复杂性。

第二章详细描述和分析三江并流峡谷区域社会的继嗣制度结构及其流变过程，探讨不同社会结构中母系与父系继嗣制度的形成、发展与确立过程中男女两性所获取或丧失的权利，包括亲属制度、婚姻制度、土地制度与生产关系、家庭的内部权利关系，以及婚姻的变动形态。不同的血缘观念和继嗣制度决定了男女两性在家庭和当地社会中所处的地位、扮演的角色及其掌握的权利；土地制度和生产方式是人们决定婚姻形态的基本要素，由继嗣制度决定的继承权及相应的家庭责任则催生了不同的婚姻缔结与支付形式，并为妇女获得相应的家庭与社会地位提供了必要前提。

第三章分析不同生计方式与性别分工模式下男女两性的角色与地位。三江并流峡谷脆弱的生态系统和地广人稀、可供耕地稀少的生存矛盾共同生成了当地半农半牧及包括商贸和手工业在内的多种生计模式。通过当地男女两性的劳动分工模式、劳动价值认同、社会政权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权利实践体系，发现存在于不同族群社会中的两性分工认知逻辑与判断标准，及其如何进一步延伸为一种等级化的空间观念。女性与男性在不同空间中的合作与竞争关系体现了社会性别制度的复杂性与动态性，同时也生动体现了由土地制度及生产方式所决定的多种婚姻形态存在与延续的内外动因。

第四章通过分析研究对象个体身体的外在表征和心理感受，解读不同社会文化系统对女性个体所产生的影响和控制机制。研究发现，“男女有别”及“女性污秽”的身体观念是不同社会对自我及他者身体的重要认知基础。社会对女性身体的认识以及女性对自我身体“污秽”的认同共同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并合力推动了女性的自我认识以及对命运的顺从感，使得女性群体成为各种婚姻形态不断延续的重要推动媒介。

第五章讨论外部环境、文化系统和社会系统之间的联结机制——性别权利与政治的代际传递功能。通过分析当地社会的家庭教育、社区教育、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机制，探讨各种政治话语与意识形态的渗透过程，分析研究对象个体人格系统的形成与变动状态，为分析和理解其行为过程中生成的性别角色与地位问题提供微观视角的分析例证。对男女两性截然不同的性别期待驱使着人们在家庭与社区中施行不同的濡化与教化方式，社会文化则通过着装、游戏、劳动与道德教育等方式不断强化“男女有别”与“内外分工”的劳动模式以及“男高女低”的社会等级观念，并通过宗教信仰的形式进行进一步巩固与强化。制度化学校教育的推行则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固化的性别区隔与差异性期待，传统的社会性别制度及婚姻与家庭观念受到冲击，传统的性别权利与政治模式的存在进一步受到挑战与威胁。

第六章用动态的视角检视和分析社会变迁对三江并流峡谷传统性别权利与政治制度的影响与冲击，探讨身处其中的男女两性个体和群体在社会变迁背景下的反应和能动状态。以包产到户为主要特征的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变革对当地的传统社会性别制度形成了有力的挑战：一是以国家话语为代表的法制观念的深入与普及，二是社会变革和商品经济推动个人权利意识的增强，三是日渐开放的社会环境及发达的传媒对原有性别制度的影响与冲击。这些共同作用同时使女性的价值空间得到了充分的拓展。

在上述章节分析的基础上，本书的结论部分对三江并流峡谷4个民族的性别政治问题进行总结性分析，试图探寻一种更加合理且细致的解释途径。尽管妇女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其能动性仍然极大地局

限于符合社会规范的空间与领域中；性别权利与政治问题的系统性与复杂性在多偶制家庭中得到了集中体现。妇女地位的屈从并不仅仅取决于其所处的经济地位，同时还涉及身体角色及其在实践和行动中所具有的地位和权利。因此，使用单一化的“高”或“低”的判断标准难以准确地阐释不同社会结构中妇女的权利地位问题，必须对之进行更加全面系统的分析与理解。妇女在维系婚姻与家庭方面起着重要的纽带与协调作用，妇女在家庭与社会中的角色与地位的变动对婚姻与家庭的存在和变动影响深远，值得进行更加深入的分析与探讨。

目 录

导 论/1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1
- 第二节 研究回顾：男性和主流话语权威书写时代的
性别政治问题 10
- 第三节 概念界定、理论视角及研究路径与方法 ... 17

第一章 多重独特性并存的三江并流峡谷/25

- 第一节 高山峡谷与垂直立体的地理气候环境 25
- 第二节 往来交融的族群及其社会文化 28
- 第三节 多样化的婚姻形态与社会性别制度 40

第二章 女源与男流：母权和父权的争夺与博弈/49

- 第一节 血缘、继嗣与家庭的传承机制 49
- 第二节 土地制度、资源配置与家庭内部的权利
实践 61
- 第三节 父权与母权继嗣争夺中的婚姻缔结与支付
方式 84

第三章 谁主内外：多种生计劳动中的性别分工模式/95

- 第一节 地广人稀之地的村镇与社会生产交换圈 ... 95
- 第二节 不同生计方式中的典型性别分工模式..... 104
- 第三节 “轻重”与“内外”：性别分工的标准 ... 124

第四章 “肮脏”的妇女：身体认识中的阴阳之别与 污洁之异/130

- 第一节 差异之源：创世传说中的男女两性角色 ... 130
- 第二节 阴阳之术：性、生育及其控制中的社会
性别权利..... 135
- 第三节 转生安魂：生命的消逝与身体的处理方式
..... 160

第四节	休闲时空中的社会性别权利·····	169
第五章 “低下”的妇女：性别政治的代际传递、更替与嬗变/179		
第一节	“天赐之权”：传统社会中的性别政治传递机制·····	179
第二节	“神授之权”：来自宗教信仰的性别政治与权利·····	188
第三节	制度化学校教育时代的性别政治建构与发展·····	201
第六章 双重边缘地带的社会文化场域：外来话语注入与新女性的崛起/211		
第一节	内地与边疆：“化外之地”的地缘政治与族群阶序·····	211
第二节	元代以降的外来话语权利注入与社会性别格局重构·····	217
第三节	边疆社会的新女性·····	233
第四节	影响、卷入与自觉：全球化时代的性别权利与政治变迁·····	242
结论 妇女何在？性别权利与政治问题的遮蔽和再现/253		
第一节	能动、系统与象征：对社会性别权利与政治问题的再认识 ·····	254
第二节	社会性别权利与妇女地位研究：从静态量化分析转向动态 现实生活·····	255
第三节	异动中的社会性别角色与地位·····	258
第四节	迈向发展之路的妇女群体·····	260
参考文献/261		
后 记/278		

导 论

第一节 研究缘起

一、研究区域：地理位置与多重独特性的并存

从通常意义上来说,“三江并流”指的是发源于青藏高原的怒江、金沙江(长江上游)和澜沧江三条大江穿过横断山脉高大的云岭、怒山、高黎贡山中幽深的峡谷,并行奔流数百公里却不交汇的自然景观。从狭义地域划分上看,三江并流地区仅包括云南省西北部的迪庆藏族自治州(简称“迪庆州”)、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简称“怒江州”)、丽江市及大理白族自治州(简称“大理州”)的部分地区。这里西与缅甸接壤,北与四川、西藏两省(自治区)毗邻。但若考虑到横断山脉在横向 150 公里、纵向 200 公里范围内被几条大江纵向切割的自然地貌以及这一区域的族群分布特征,那么“三江并流地区”这一概念所涉及的地域要远远超出上述列出的区域范围。考虑到这一区域内高山峡谷的地理地貌特征,本书将研究区域确定为“三江并流峡谷”。

本书研究的区域位于四川省、云南省和西藏自治区结合部,东经 $98^{\circ}\sim 100^{\circ}30'$ 、北纬 $25^{\circ}30'\sim 29^{\circ}$ 之间。这里是地球上挤压最紧、最窄的巨型复合造山带:在横向 150 公里、纵向 200 公里范围内,自西向东并列着担当力卡山、独龙江、高黎贡山、怒江、怒山、澜沧江、云岭、金沙江等几组山脉群和深谷,山峰与江面平均高差 2 500 米左右,这些山脉群构成了横断山脉的主体。

长江发源于青海唐古拉山脉主峰格拉丹东西侧,到青海玉树县境上游进入横断山区,称为金沙江,经西藏从德钦流入云南,主要支流有渔泡江、龙川江、普渡河、牛栏江等。汉代称金沙江为黑水、绳水,三国时今渡口以上部分称为淹水、雅砻江口以下部分称为泸水或泸江水,自元代起称为金沙江。从长江江源水系汇成通天河后,金沙江流经云南高原西北部、川西南山地,到四川盆地西南部的宜宾接纳岷江为止,全长 2 316 公里,流域面积 34 万平方公里。

怒江,又名潞江,发源于青海唐古拉山西南山麓的吉热伯格。其上游藏语

称为拉曲卡，因江水颜色深黑，古代地理著作《禹贡》称其为黑水河，向东流入他念他翁山和伯舒拉岭之间的峡谷，经西藏从贡山秋那桶流入云南，在云南境内流经福贡、泸水、保山、龙陵、施甸和镇康等县（市），从潞西县出境流入缅甸，称为萨尔温江，最后汇入安达曼海。

澜沧江发源于唐古拉山脉北麓，经西藏由德钦流入云南，流经维西、泸水、云龙、保山、临沧、景洪等县（市），在勐腊出境入缅甸、老挝，称为湄公河；经泰国、越南和柬埔寨等国家，最后注入南海。

三江并流峡谷区域面积达 17.6 万平方公里。其中，四川省 3.9 万平方公里，涉及白玉、理塘、乡城、稻城、得荣等县；云南省 2.7 万平方公里，涉及德钦、维西、贡山、福贡、中甸等县；西藏自治区 11 万平方公里，涉及芒康、左贡、贡觉、察隅、盐井、碧土、察雅等县。从行政区划上看，本书研究的区域分别隶属于四川省的甘孜藏族自治州（简称“甘孜州”）、云南省的迪庆藏族自治州和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以及西藏自治区的昌都地区。

按照藏族传统的历史地理概念划分，本书所研究的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和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同属康巴藏族聚居区。其中，甘孜藏族自治州是康巴藏族聚居区的主体，地处川、滇、藏、青交界处，全州地处青藏高原东南缘，山川呈南北纵列式排列，有贡嘎山等山脉，有金沙江、大渡河、雅砻江等主要河流，是青藏高原向四川盆地的过渡地带，地势北高南低，平均海拔在 3 000 米以上；全州总面积 15.3 万平方公里，占四川省总面积的 1/3，下辖甘孜、炉霍、新龙、白玉、德格、石渠、稻城、乡城、得荣、巴塘、道孚、雅江等 18 个县。境内有藏族、彝族、羌族、苗族、回族、蒙古族、土家族、傈僳族、满族、瑶族、侗族、纳西族、布依族、白族等 25 个民族，约 90 万人。其中，主体民族藏族占总人口的 80%。

迪庆藏族自治州藏语意为“吉祥如意的地方”，是云南省唯一的藏族自治州，位于云南省西北部的滇、藏、川交界处，澜沧江和金沙江自北向南贯穿全境，全州辖香格里拉（即中甸）、德钦和维西 3 个县，总面积 23 870 平方公里；境内聚居有藏族、傈僳族、纳西族、汉族、白族、回族、彝族、苗族、普米族等 9 000 人以上的民族和 16 个其他民族，藏族约占总人数的 33.81%。

被誉为“藏东明珠”的昌都地区位于西藏自治区东部，东临金沙江，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接壤；北接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南接云南省，并有一段地区与印度和缅甸接壤；西南部以色齐拉山为天然界线，与工布地区相连；西北接那曲地区。整个地区总面积 11 万平方公里，人口约 60 万，下辖昌都、芒康、贡觉、八宿、左贡、边坝、洛隆、江达、类乌齐、丁青、察雅等县。因扎曲和昂曲在昌都相汇为澜沧江，因此“昌都”藏语意为“水汇合处”。昌都地区地处青藏高原横断山区，除南部和一些河谷地带地势稍低外，